

【在人间】

## 我骑旧了两辆自行车

□牟民

1981年7月师专毕业，分到栖霞教育局时，我想着，妻子在城区小庄乡卫生院工作，最好能让我留在县城，或者去小庄乡初中教书。领导说，乡下县立二中紧缺教师，你去那里工作吧。我没有二话，卷起铺盖，骑着父亲买的大金鹿自行车去了50里外的二中报到。和我同去的还有五位师专毕业生。

栖霞二中地处招远、黄县、栖霞三地交界，学校建在公路边，四处无村落，客车一天一次往返莱阳和黄县，在这里就读的学生大都是步行或者骑自行车往返于家校之间。教学条件艰苦，教职员购物须到十里地外的乡驻地。学校晚上自行发电，断电了就用煤油灯照明办公。这里的教师基本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分配来的，年轻教师甚少。我来了，领导便让我担任班主任，教两个班的语文课。教学任务繁重，星期天轮到我值班，就不能回家。即便没有轮到我值班，我记挂着班级，星期六晚上要跟班检查，等星期天早晨才骑着自行车，跑50里路，回家跟妻子团聚，帮妻子收拾家务。学校距妻子工作的卫生院50里，离乡下老家50里，从老家再到卫生院，又恰好50里，典型的等边三角形。隔半个月，我必回家看望父母，星期六上午提前往家赶，在家吃过午饭，再返回卫生院。如父母农活忙不过来，我便在家相帮，第二天到卫生院处理一下家务……自行车轮不停地转动在马路上，我如个旋转的陀螺，休息日也没个休闲时。

第二年，女儿出生，妻子休完产假，边带孩子边上班，忙起来只能把孩子放在家里，幸好有个邻居的婆母住在隔壁，主动帮忙看护孩子。妻子让我去找领导，赶快调到医院旁边的农技中教学，她实在忙不过来。我说，学校缺教师，我哪好意思开口呀！妻子再没吭声。

常常是在家里待一个白天，星期天晚饭后，我就骑着自行车往学校赶，自习铃声响过，我刚好走进班级，接着上两节自习。第三节自习后，学生就寝，我接着查宿舍。我和一位中年单职工教师住一个宿舍，他家在农村，家里农活多，羡慕我是双职工、没压力，哪里知道我这个挂名双职工依然过着单职工生活，相比他，只是没有农活的牵挂。早晨起床铃声一响，我赶紧爬起来，穿衣洗

漱，几分钟后，准时来到学生宿舍点名，领着学生跑向操场。早操后上自习，早饭后备课、上课，四节课过去，午饭后，检查午睡；下午，备课、上课，两节课后有一节课外活动，参与学校组织的各种比赛，跟着又是一节自习。不知不觉太阳落山，又接上了晚饭、晚自习……日子那么充实，我竟一时忘记了妻女在家是怎样生活的。

等到下个星期六的傍晚，我回到50里外的家，妻子正在班上，女儿趴在床边睡着了。正巧赶上邻居大娘回老家吃婚宴，女儿没人照料，妻子把女儿锁在了家里。我赶快抱起女儿，女儿嘴边流着口水，脸贴在水泥地上，咯出了印痕。她醒了，喊着：肚肚疼！掀开她的袄，我看见女儿肚脐眼下一道深深的血痕，已经结痂。我问女儿，咋磕的？女儿指指炕沿。原来，晚上妻子值班，女儿被锁在家里，她睡醒后，从炕沿往地下滑，炕沿不平，嫩嫩的肚皮被刮破了。

见我回家，妻子满脸不悦，我坚定地说，我回去便要求调动。可回到学校，看到老师和学生，我不好意思开口，把调动一事又忘在了脑后。很快，我送走了两批学生。和我一起来二中的那五位年轻教师第三年全调走了，只剩下我一人。

这一干，又是好几年，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被我骑得处处掉漆，换了三次车胎，车链子换了一次，跑起来吱吱呀呀的，仿佛患了气管炎。第八年，我换了辆新自行车。骑上新车，兴致勃勃，脚蹬车轮，很是轻松。依旧是沙路，但我的速度仿佛加快了，50里路程，往日需两个小时，现在只用一个半小时。

女儿上小学了，妻子也不再关心我调动一事。多年后，我常常想，妻子独自撑着家，带大了女儿，没跟我分手，真不容易！

就这样，我在乡下的县立二中过了九年单职工日子。后来，学校校医调走后，教育局通过卫生局，把我妻子调往二中，我们才结束了两地分居的日子。

那辆新自行车也成了半旧的，并没闲着，修修补补，我骑着它，假期带上妻女，回老家看看。多年后，它光荣退休了，搁在车棚里，静静地陪伴着我。每次看见它，都恍惚觉得车轮在转，它载着我，奔波在乡间路上。

（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高中退休教师）

□孙晓明

这星期，回家陪老母亲，一进家门就看到茶几上放着两个柿子，有枝有叶，柿子已经熟透，汁液已渗出表层。我知道，这时吃柿子就叫“喝柿子”。

这几年，弟弟每年秋天都要去泰山山根处摘几个红彤彤的柿子，拴在一起放在窗台上，或挂在墙上，再搭配一些板栗，一副秋天的模样，一来是给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看看，刺激一下她的视觉和记忆；二来弟弟搞美术培训，给孩子们提供摹写的实物。

每到深秋季节，行走在泰山北麓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，树叶已掉光，只剩下累累果实，煞是好看，也成为泰山北麓的一大景观。

我最早接触柿子，是上世纪70年代初，姥爷是南京金陵大学园艺系第一届毕业生，在泰安市林业局当技术员，泰山东麓的一些山区公社都是姥爷的“活动阵地”。那些年果树技术人员比较少，姥爷的足迹可以说踏遍了泰山南北。记得有一年，我和姥姥从泰安坐长途车去看望长期驻扎在下港的姥爷，一路颠簸，小小年纪的我被颠得晕头转向。待到了姥爷在乡下的住处，姥爷拿出翠绿的金帅、国光苹果，还有一大串红红的柿子，那是我头一次“喝柿子”，那滋味，真是香甜！这难得的美味，让我旅途中的疲惫一扫而光。

记得有一年秋天，我和爱人陪岳父岳母去济南，走的是泰山北路，弯弯曲曲的山道，苍绿的松柏树夹道，一片片红叶、一串串红艳艳的柿子点缀其间，红绿斑驳，尽显秋日泰山山脉的秋色、秋意，两位老人也被窗外的美景吸引了。我们停下车，以柿子树为背景，给两位老人拍照。在秋天的和煦阳光下，两位老人手牵着手，恰巧他们俩都穿着红色的薄羊毛衫，背后远景是层层山峦，近景是那串串高高坠在枝头的红得透亮的柿子，一派祥和温馨的画面。那时我们当地报纸正在征集“随手拍”照片，我回来后匆匆起了个“伉俪情深”的名字，将照片投给了报社。几天后，爱人拿着一张报纸问我，这是你拍的吧？我拿起报纸一看，署名“佚名”，果真是我给二老拍的那张柿子树下的照片，匆匆忙忙也忘了写上名字。世事难料，这张照片竟成了岳父和泰山的最后一张合影，老人和柿子染红的泰山秋色一起定格在我们的记忆里。

前些年的秋天，我和弟弟一家有一个重要的“拾秋”活动，就是去捡拾柿子和栗子，有时也邀上三五好友，带上馒头、烧饼、榨菜、香肠等食物，一早就奔赴泰山东北方向的栗子峪附近的山上。之所以选择那里，一是离泰安相对较近，有山有水，栗子峪水库在大山深处，少有人知，可谓风景那边独好；二是那里的山民有好几户我们都认识。到了地方，有两大“任务”，一是摘柿子，



二是捡拾栗子。说是摘柿子，其实是“捡漏儿”。山里人一般在柿子八成熟的时候就将其摘下来，用毛巾或布苫盖起来，叫作“捂柿子”，主要是为了去除柿子的涩味，也避免了熟透的柿子不好摘的情况。那些长在最高树梢上的柿子，山民一般都放弃不要了，而我们就借助陡坡，在高空探身去摘。

一来二去，我和弟弟结识了栗子峪的一户山民。山里人憨厚实在，这位姓张的年轻人看到我们不辞辛苦地“捡漏儿”，便邀请我们去他家喝水，还让我们以后不用这么费劲了，走时拿上一筐栗子和柿子即可。我和弟弟说，我们主要是来玩的，“捡漏儿”只是捎带的乐趣。

交谈中我们了解到，小张的父亲原来是石匠，小张也学了这门祖传手艺。前些年他和别人一起经营过泰山石，后来帮人刻墓碑、凿凿石，在家管理着一片山地，种着核桃、栗子、柿子树，每年的收入也算过得去。因为媳妇患病、孩子还小，他也就没有去外地打工，无法赚更多钱改善生活、发展事业。听小张这样说，我和弟弟都宽慰他：你们还年轻，干什么都行，这片山地也是个宝，只要勤劳肯干，日子会像柿子一样，越过越红火的。

夕阳的余晖洒在柿子树上，格外耀目，当我们离开小张家下山时，小张硬是要我们带一些柿子、核桃、栗子回去，我们推辞不过，临上车时，弟弟、弟妹悄悄把钱塞进小张女儿的小书包里。

（作者为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理事、泰安市作协会员）

【浮世绘】

## 温暖的小名

□百夫长

傍晚，陪母亲在村道上散步，一辆小车缓缓停在身旁，李二娃从驾驶位探出头，对我们说：“明天来我家吃饭啊！”母亲微笑着答应下来。待车驶远，我问母亲：“李二娃的大名叫什么？”母亲告诉我：“他叫李银天。”

在吾乡，村人大都称呼对方小名，大名只在学校才有人叫起。我常年在外，对村人的大名更是不知。李二娃早年外出打工，两三年才回一次家。七八年前，他开始在邻省的山区开超市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去年，他在村口新修了一幢三层小别墅，我每次回乡探亲经过他家门口，他都会递给我一支烟，与我聊上一会儿。他这次回来，是为了嫁闺女摆喜酒。

第二天是国庆节，许多在外地工作的村人都回来了，李二娃家喜宴现场的气氛很是热烈。大家年少时外出上学、打工，如今年过不惑，再次回到老家，彼此都觉得十分亲切。看到熟悉的人，大声打着招呼，叫着对方的的小名，一把握住对方的手，聊近况、忆过往，久久不舍得松开。此时，没有什么老板或打工者，有的只是大娃、二娃。前者是在城市生活中被贴上的标签，后者是从小叫到大的小名，是这方水土刻在骨髓里的温暖印记。

小名，是村人身上的胎记。在吾乡，小孩子大多有小名，人人可称之，但若是家中长子或长孙，父母多半会逐字斟酌，为其取个响亮的大名，自小便以此称呼，比如金明、春林、学文等等。这些亮堂堂的名字，寄托着父母满满的希冀。

过去家里孩子多，如果是男孩，便依次叫大娃、二娃、三娃；如果是女孩，便叫大姐、二姐、三妹。三娃、三妹，有时也会被称呼为幺娃或幺妹，这里面有人父母者对最小的子女的疼爱。我在家中排行最小，母亲便喜欢叫我“幺娃”，每次听到母亲如此唤我，我都觉得心里暖暖的。

小名中也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名字，大多有来历可溯。我小时候最好的玩伴秋树和远宏，分别叫八斤和泥娃。秋树刚出生时，他父亲有军叔专门拿秤称了一下。当时，有军叔已经把秤砣尽量往里拨，还有八斤多一点。有军叔看着哭个不停的儿子，当即给他取了个小名叫“八斤”。远宏的小名叫泥娃，那是因为他父亲老冯木匠经常外出替人打家具，他母亲要下地劳作，便把他放在田埂上让他自己玩，一天下来，远宏总是把自己弄成泥人，故得“泥娃”之名。

也有一些小名，取得简直没道理，不知因何而起、从何而来。我二哥最好的玩伴黑皮，长得一点都不黑，小时候甚至比别的孩子皮肤都白。黑皮后来在村里做油漆和门窗生意，是个热心肠，谁家有个急事难事，他都会第一时间赶过去帮忙。现在想来，倒觉得他真有点“孝义黑三郎”宋江的风范。

小名是个神奇的东西，那里面有归宿，有温暖，有亲情。儿时，傍晚时分，每每听到母亲唤我小名，扭头看到自家屋顶炊烟袅袅，我都会马上抹去头上的汗水，告别玩伴们，撒开脚丫往家里跑。而今，我离家经年，母亲越来越老，我真希望还能一直听到母亲唤我的小名，这样我就可以不管千里万里，即刻收拾行囊，奔回那个叫做故乡的地方。

（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海南省作协会员）